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政府“自我革命”须打破思维定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改革列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在诸多改革中，把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放在了首位，强调要从政府的自我革命高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

2013年以来，政府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不过，相对于政府的大胆改革，市场、社会的反应则不如预想中的那么热烈，不少民众甚至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这里有改革红利释放的时间差因素，有一些审批权是下放而非精简的因素，也有这次精简的审批事项本身就是一个“僵尸”的因素。

更主要的，则是经过30多年的第一轮改革，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多元化了，而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则基本上仍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制度上，维系着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盘”，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惯性运行着。

理论上，我们现在只有中央政府对民众的服务与管理是全覆盖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没有做到实有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全覆盖。我们其实不光有一个十几万人的“北漂”，全国范围有超1.5亿的“漂泊一族”。地方政府一个普遍的思维定势就是：户籍的（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所说的体制内的），我管；流动的（社会的或体制外的），与我无关。这不仅影响着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对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也形成巨大的压力。

政府改革之所以是一场“自我革命”，其实就是要通过全面改革，让政府主动适应从计划决定一切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转变，适应社会高度同质到日益多元化的转变，实现政府的全面、彻底升级与改造。（2014年3月10日《新京报》江南一木）

要有适应改革的立法反应力

改革要法律授权，在今天有重要意义。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有全面部署，有国家行动，要解决的是当前国家发展重大难题，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战略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改革不是打打“擦边球”，行权宜之计，或者化解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纲领性、全局性的指导。所谓先立后破，形象地说就是，设计好了再行动，务求科学和谨慎。那种试探法律甚至直接突破法律的闯关方式，于今不再适用，甚至需要警惕。

回顾30多年前，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突破思想禁忌，打破制度牢笼，探索、试错、纠错，都是“摸石头”。在那个年代，思想解放一点，勇气增加一点，都能很快取得改革成果。那些优秀的改革创造、突破，往往既无先例可循，也“无法可依”，本质上，是以一种“零星试验”，为国家、社会转型探索出路。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国家要走怎样的道路，要朝着什么方向，已经无比清晰。今天，改革的最大任务已不是打破制度牢笼，而是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不再是一个“不破不立”的激荡过程，而是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靠什么求证？就是法律。

当然，重大改革没法律规定不得授权，这不仅仅是重申改革的法治化原则，也对改革的法治化能力提出了要求。改革要法律授权，并不意味着改革调整将失去了机敏性，说明法律自身同样需要一场改革进程——那些不适应当下现实的法律，甚至那些不合理的法律，需要裁汰；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及时反映到法律中。甚至，改革的方案设计，可能就是以法律规定来体现，某些改革措施将直接等同为立法、修法过程。

世界上，任何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或者进入快速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其国家进步，都由稳健的法律体系支撑。也就是说，现代化、法治化国家，是以立法的形式向前推进。在这些国家，重大的改革调整，往往也体现为立法成果，一届政府的政绩甚至可能就是一个法案。当前，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国家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这意味着，国家重大改革调整要在法治化轨道完成。这不仅是说改革要遵守法律，也是要让改革意图首先上升为法律意志，让改革手段事先确立为法律方式。也就是说，同样要以立法推进的方式为改革“授权”。

改革任务异常艰巨，今年政府报告拟定的改革事项就有60多个，可能涉及的法律调整内容自然不少。改革不逾越法治化轨道，同时确保改革调整灵敏度，必然对法律调整效率提出了考验。总之，国家立法程序、机制，要与当前改革节奏相匹配，要有适应改革的快速反应能力。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某种意义上，正是为国家治理汇总立法意见，而今年的两会主题就是改革，围绕改革进行立法讨论将是两会重任。

重大改革没法律规定不得授权，法律同样要有适应改革的快速反应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2014年3月10日《长江日报》肖畅）

公开权力清单只是改革的新起点

继去年展示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万里长征图”引起轰动之后，广州政协委员曹志伟日前又亮出了长达3.8米的“人在证途”，再一次受到全国关注。曹委员不过是把人们见惯不惊的事情做了一次集中展示而已，真正发人深省的，不是那两张刺眼的图表，而是每一项审批、每一个证件的背后对应的、无处不在的坚硬权力。这直观地展示了以审批制度为核心的行政权力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覆盖与管控程度，也清晰地表明，在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阶段，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多么紧迫而艰巨。

恰好能与此形成积极呼应的是，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这是现代政治文明和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为政者的自觉与自信。而在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中，备受关注、广受赞誉的权力清单制度仅仅是朝着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这应该成为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起点。这当中，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和考量。

第一，被锁定的行政审批权力本身是否科学。行政审批项目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转变政府职能才是精简行政审批之根本。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等一系列要求，可以预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行政权力的覆盖领域将经历一个压缩的过程，现存的行政权力清单相应地还将精简和优化。由此，在权力清单中被公布的“底数”显然不是“保底的数”，恰恰相反，它应该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顺应政府职能持续转变进程，不断进行再梳理、再论证、再精简的“变数”。

第二，行政审批权力的行使是否规范。权力清单仅仅是一张清单，而实际的权力行使却有着很大的演变或异化空间，这需要有一个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科学刚性的完整制度体系来规范。长期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具体操作流程的再造和优化上，以期尽可能地在既定框架内提高效能，其积极意义当然应予充分肯定。然而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来看，在行政审批权力行使方面，除了解决流程问题之外，更需统合人、制度、工具等多种因素，在责权的明晰、全程的监控、作风的转变等方面综合施治。

第三，约束行政审批权力的笼子是否管用。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因此，既要看到公布权力清单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紧密逻辑关系，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目前还存在着不可小视的距离。众所周知，行政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能完全寄望其能有效地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而“制度的笼子”说到底也是一种权力，要真正关得住行政权力，这个笼子就必须是通透明亮的，无可遮掩地呈现在阳光之下和公众面前；必须是坚固耐用的，面对强大行政权，也能充分发挥监督、制衡、约束作用；必须是铁面无私的，笼子的钥匙绝不可能由被监管者自己或者与其暗通款曲者持有。这实际上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让人民监督权力”的问题，还需要更科学更精细更管用的制度设计与刚性执行。（2014年2月22日《成都商报》杨晓阳）

◆史海钩沉

一份一百多年前的日本谍报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腐败，而不仅仅是官场腐败。

清朝“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

清廷腐败规模是全局性的。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10年，迟则30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16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蘖，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2014年3月5日《老人报》雪珥）

◆评 论

文化的市场与战场

《来自星星的你》来势凶猛，新韩流成了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韩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领事金镇坤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儒家思想是韩国文化的基础，影视剧提倡寻求真爱、尊老爱幼、夫妻和睦这些普世的人生观价值观。”

另一些数据或能说明更多问题。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调查显示，2012年赴韩旅游1000万人次中280万来自中国，而2013年赴韩旅游的中国公民已达380万人次，韩流粉丝中有58%的人到过韩国旅游。去年韩国文化产品的海外输出中，出版产业2.72亿美元，卡通书籍1800万美元，大众音乐2.75亿美元，电子游戏29.78亿美元，电影2300万美元，动漫片1.2亿美元，电视剧2.42亿美元。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我赞成这个说法。一个人的血液指标可检测其健康程度，一个民族的强盛，文化更是重要参数。老人跌倒没人敢扶居然成为持久的公共话题，说明社会风气已经病得不轻了。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让民心柔软、健康。

思想文化领地看似无形，实为兵家必争的战场。耗费巨资去购买纽约时报广场屏幕放映形象片，对国人形象加不了分；再多金色大厅、林肯中心的包场，也未必能打通中国文化输出的管道。新韩流的入侵应该令我们深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究竟是怎么变成了舶来品。（2014年3月10日《新民晚报》唐宁）

“研究生等同大专生”是严重警示

据《新京报》报道，“高考科目会减少，不分文理科”，“建议取消三本改为职教”，教育继续成为两会上的关注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的一番话尤其发聋振聩。崔向群说，我们单位也是用人单位。总的感觉，毕业生质量在下滑。比如来的一些研究生你会感觉到他的动手能力和理论基础让人不是很满意。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崔院士的话语或多或少地验证着公众的某种感受，但坦率地分析，类似的结论却有失严谨。首先，“不如”本身就是个含糊的概念，如果仅仅以动手能力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其次，时代在变化，拿同一标准来对过去的大专生和今天的研究生对比，也有失严谨。如果硬要进行比较，无疑需要一个在大量抽样后的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但显然的是，如此体系至少崔向群院士现在还拿不出来。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将崔院士的观点当作一种抽象的批评，可能更为准确。崔院士在表达着自己具体的研究生用人感受，实际上说的是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正在遭遇某种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2014年是我国研究生扩招的第十二年，但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就开始不及本科生。冰冷的事实足以道出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当研究生的就业率已被本科生乃至专科生远远抛下，所谓的研究生教育其实是一种无质量的扩张，其培养机制必须进行现实转身。

以上并非危言耸听，从1978年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算起，高校研究生教育已走过30余载的蹉跎岁月，分析此中的沉浮得失，完全可以用王小波的三本书名作划分。倘若说在上世纪末，大学教育仍为精英教育，研究生培养因为其严进严出而备受用人单位欢迎，它是研究生教育的“黄金时代”，那么本世纪初至研究生扩招的最初几年，则是“白银年代”：大规模的扩招尚未开始，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也还差强人意，研究生就业虽不至于热得灼手，也不至于太困窘。而大规模扩招至今，则无疑是研究生教育的“青铜时代”：规模庞大、教育质量时有丑闻爆出，就业更是令所有人忧心忡忡。

更进一步说，较之研究生教育扩招的十几年，低就业率其实还不是它失落的全部，它最大的失落，其实在于遗失了整个社会对此种高学历培养模式的认同。关于这一点，报章坊间已经看得很清楚。就研究生报考的动机看，很多报考者并非奔着学术或自我提升而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为暂时寻找就业的“避风港”；具体到培养模式上，本应该以学术能力为参照的培养路径，却常常被简单化地定义为应该“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证书”，于是一个导师带上数十个研究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作坊般的培养方式，自然只会造成低能的高学历者，最终被热衷于人口红利的利益社会所冷落，演变成就业上的不尽如人意。

就整体素质而言，我相信绝大多数研究生高过中专生、大专生，但当就业市场以及观察者都开始对此持否定态度，这说明重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社会信任迫在眉睫。大力度的扩招需要放慢脚步，与此同时，研究生招录与教育模式也要改革，比如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能否更多赋予高校甚至是具体导师自主权？比如，如何最大限度地以科研项目为培养内核，令学生都从中获得学术性收益。但无论从怎样的视角来评判，“研究生等同于中专生、大专生”都是一种严重的警示，崔向群院士的批评需要被教育管理者听见。（2014年3月10日《大河报》王聃）

大学生的培养需要分层定位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一直是个热点。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指出：目前国内应届中学生90%上大学，仅10%上技校。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不愿意到一线工作，造成了整体大学生就业困难而普工、技工严重不足的局面。建议国家取消“三本”招生，并将该部分计划划入职业教育。

大学生的素质似乎成了一个“罗生门”，在用人单位看来，颇有“高不成，低不就”之势，接受了大学教育，普工、技工的活不愿意去做，也做不好。但一些“高端”的活似乎也拿不下来，用人单位对“动手能力和理论基础不是很满意”。而在学校看来，仍然“一代一代都在提高”。孰对孰错呢？

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产能过剩”，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陈丽芬代表大体说到了点子上。现在的高等教育，的确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高等教育的规模，应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但“大跃进”式的扩招，使得大学教育的规模超过了社会的需求，社会不能够提供那么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而反过来，又造成结构性的用工荒，普工、技工招工难，为什么呢？高中毕业生都去上大学了，上完大学就不愿意来这些岗位就业了。

而过度的扩招又造成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扩招后各种软硬件条件跟不上，生源素质降低，学生得不到高等教育应有的培养条件，也有部分人达不到高等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大学在自身的定位的问题上乱了方寸。本来之前作为精英教育，培养高端人才的定位是明确的。而扩招后，先是囿于原先精英教育的模式，但受到就业市场的倒逼之后，又意识到精英教育的模式难以适用于海量的学生，培养目标又偏向市场导向。这又导致了原先精英教育中固有优势的丧失，比如研究生教育，朝着培养高级技工的方向急剧坠落。

因此中国的大学需要重新定位。社会的需求是多元的、复杂的，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定位也不可能“大一统”“一刀切”。陈丽芬委员提的取消“三本”招生，其实就是让这部分大学重新定位，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但“三本”大学在中国的大学中只是少数，其他大学也面临着认识自身、明确定位的问题。少数大学，还是应该保持精英教育的定位，为社会培养较高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的毕业生。而大部分的大学，则应该降低身段，面向现实，面向市场，明确自己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这样，大学毕业生，既有能够“上得厅堂”的，也有“入得厨房”的。用人单位也可以做到各取所需。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或许能够得到改善。（2014年3月10日《羊城晚报》周云）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